

孫穗芳

繼續祖父孫中山的事業



資料圖片

從去年開始，孫穗芳為兩岸及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學陸續捐贈孫中山銅像，希望祖父當年富國強民的思想得以承傳。本地幾所大學也已陸續受贈銅像。她的目標是一百座，也是紀念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動之一。按照計劃，年底或許能完成80至90尊銅像的揭幕，目前這個想法已實現了一半。無論這最後的目標能否按期完成，這種捐贈速度都是驚人的。「我祖父講，『忠孝仁愛、信義和平』這八個字，是中國5千年的固有文化，就算只把『忠孝』推到極限，國家也自然能強盛起來。我是在愛國。」孫穗芳用堅決的口吻說。

與父親冰釋前嫌

約20年前，她停掉了手上的房地產生意，決定全身心投入對祖父的紀念和其思想的研究和宣揚的事業中。為了籌集銅像製作的經費，除了四處奔走募款、演講，她更賣掉了在美國的別墅。因年長帶來的各種頑疾也常會折磨她，她的腰上要貼很多膏藥。「貼得多了，皮膚就會爛。」她早年離異，為了祖父，生活也變得越來越簡單，幾年前她在美國的一位家庭殷實的忘年交，有心要撮合她與自己的兒子。「我一想到我祖父和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就覺得，對方再有錢也不是我的。我只能獨自走這條路。」

孫穗芳是孫家子嗣中，唯一以推動和宣揚祖父思想為志業的人。按身份講，她是庶出，卻從小被周圍人說與祖父「驚人的相似」，令她對祖父充滿好奇。她的母親嚴謹娟曾做過孫中山的獨子、時任台灣行政院院長孫科的私人秘書，並不是明媒正娶。「母親懷我的時候，父親就拋棄了她，她差一點不想生我。」她對父親的感情複雜，跟隨母親輾轉生活在上海、香港和台灣間，直到1965年在多方親戚的幫助下，孫穗芳才在台灣第一次見



（左）孫穗芳與母親。（右）孫穗芳十三歲。



1981年，孫穗芳參加宋慶齡追悼會，左二為彭真，右一為鄧穎超。

75歲的孫穗芳的眼睛裡，有着和祖父孫中山相似的神韻，直挺的鼻子、寬闊的前額、臉頰飽滿，據說她是孫中山的後嗣中最像祖父的。雖然從沒有親眼見過祖父本人，但她自覺他們之間，總有着非同尋常的感知。這種奇異的感知，也令她成為孫中山強國理念的堅定擁護者和推行者。

上周，孫穗芳受光華及新聞文化中心、港台婦女協會之邀，來港舉辦「我的祖父孫中山先生」演講。雖然在夏威夷生活近半生，她的口音中還是帶着濃濃的上海腔調。

文/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捐贈孫中山銅像，是孫穗芳推行孫中山強國理念的方式。

第一次見到父親孫科時，孫穗芳已三十歲。



一九六九年，孫穗芳博士與父親合攝於臺北。Dr. Lily Sui-fong Sun with her father Dr. Sun Ke in Taipei.

到了生父，那時她已30歲，而對方也已是75歲的白髮老人。「只有和父親相認，才能認祖歸宗，不然祖父的思想也沒得傳。」「我問父親為甚麼不要我，他說，我從來也沒有不要你。」孫穗芳念佛，「我最後還是把我父親、母親、前夫和祖父都一起超度。」

1985年，已在夏威夷定居的孫穗芳在深圳成立「孫逸仙心血管醫院」。「因祖父曾在那裡從事過革命活動，而父親後來又死於心肌梗塞。」她也在夏威夷的大學圖書館內設立長期展覽，並成立「孫逸仙和平教育基金會」並出任主席，向世人介紹祖父的生平偉跡。

放下生意堅定志業

「1981年宋慶齡去世，我參加完追悼會，回家後就把祖父講《三民主義》的錄音拿出來反覆聽，還特地學他的廣東話發音。結果那段日子有兩次夢到祖父，囑咐我將三民主義的精華帶回中國。」她覺得能和祖父隔界對話。

對她刺激最大的，是84年受邀去日本神戶參加孫中山紀念館的開幕禮。「有很多研究孫中山的專家慕名前來看我，他們說我的祖父了不起，都對他表示尊敬。但我那時的認識很淺，覺得非常羞愧。」從此她開始鑽研祖父思想，收集相關的歷史資料。

「祖父很偉大，也很有遠見。他的理論都是來自他的實踐。他當年把總統位置都讓給袁世凱了，他不是一個自私的人。」

孫穗芳少年在上海唸書成績優異，卻因出身背景而成為階級鬥爭的犧牲品，差一點被大學拒諸門外。後來她寫信給繼祖母宋慶齡尋求幫助，一年後成功被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錄取。可惜還沒有畢業，母親在香港病重，她前往香港探親，轉讀香港大學商科。「有了現在的使

命，生意甚麼的都不再重要。」

人到中年才認清自己真正的志業，負面壓力也格外多。曾遭過家族裡其他成員對她身份的不認可，最令她難過的，還是見到祖父的功績和影響被人淡忘甚至抹去。「80年代中，我在南京見到一些本來刻有《三民主義》的石碑，上面的字被一個個鏟走，就像一把插入我心臟的利劍。」今年再次回到南京，參加《我的祖父孫中山》一書的修訂再版首發式，此書已於199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30周年首次刊印，由孫穗芳耗時十年書寫完成。

有祖父的守護

「之後我去參拜孫中山陵，爬了392級台階，鮮花鞠躬，突然隱約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對勁。後來發現，原來殿堂中間牆上的《會議法則》一部分被無故抹掉了！我強烈抗議，要求他們恢復上去！」孫穗芳一邊說着，眼睛霎時潮紅起來。現在時常也會夢到祖父，「他總是在夢中鼓勵我，叫我不怕，他會保護我。」時間有限，她更堅定要實現樹立孫中山銅像的做法，「我不是要出名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祖父。現在世界上沒有

哪個名人的後代，能像我這樣有如此堅定地承傳先輩思想的信念。」孫穗芳並不指望自己的下一代還能繼續，「我可能是最後一個，可是我可以去喚醒很多人，當他們對中華民族、對孫中山所代表的意義產生認同時，這些人就是我的延續。而且，我有信心可以長壽，能做多久就做多久。」



「在路上」系列（一）

編按：他們在路上，用腳、用單車、用各種方式，物理空間的地點永遠都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。他們要尋找的是勇氣，是心靈的棲息地。

周榕榕 在路上的存在感



周榕榕

筆者問83年2月出生水瓶座的周榕榕，當她隻身一人，踩着單車，搖搖晃晃的行駛在海拔好幾千米的險山粗礫石間時，她在想些甚麼？「不記得了，」她調皮的笑了笑，露出了虎牙，「但是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存在。」「存在感」這個詞，後來也經常出現在她隨後的描述中。從雲南大理到拉薩，2千多公里的山路，30多天卻彷彿經歷了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摔倒在山崖邊，那與死亡咫尺天涯的驚魂未定，雨雪冰雹的洗練，再加高原毒日的煎熬，路遇各色人等呈現人性百態，有些「西天取經」的戲劇性。

實實在在的存在感

是的，這一切只是周榕榕千萬個旅行細胞中，突然彈跳出來的一個，和失戀、失意、失足等任何人生負面能量無關。她的單車之旅的目的只有一個：以一種「強身健體」、「經濟實用」的方式，完成一段旅程而已。

「從來沒想太多，自己也不太清楚到底是為甚麼。」後來她似乎略微明白了一些，「一直到旅程結束，我才發現最

難的，不是疲倦、寒冷或者其他，而是與「放棄」這個念頭對峙。摔倒並不痛苦，苦的是要掙扎着爬起來。或者（只是或者）我騎車，只是為了想知道自己會在哪一點上放棄掙扎。」她在旅行筆記中這樣寫道，而出發前一句朋友的玩笑話，真的也成為她的8萬字處女作的題目：《死在路上也不錯》。沒見過這麼瀟灑的女孩子。

當周榕榕一頭短髮、T恤運動褲、腳踏土黃色登山鞋坐在面前時，筆者並沒有看出她身形的變化，好像「腹肌凸顯，腿部和胳膊因肌肉而繃緊」的體驗，她在書中提到過，但她的眼神裡有一種沉着，笑起來又毫無防備，這種自信卻能讓人一下子感知得到。她有一副結實又靈活的身體，中學打籃球校隊，大學打院隊，體育細胞發達。西藏單車之旅前一個月，她從朋友手中借了架二手單車，每天從大園踩到中文大學。「每天回家，母親都會問，我做了甚麼搞到全身濕透，無比疲倦？我說，是啊，我也不知道。」出門遠行超過1個月已是常事，母親從不細問，這次她更背着母親

上路，「她什麼都知道但裝作甚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其實我是很希望找旅伴的，」出發前在網上廣發英雄帖，「回應寥寥，再發去我的行程計劃，僅有一點回音也沒有了。」終於在出發前，有剛辭了工的女孩子願意同行，「問她平時做運動麼，她說做的，再問她具體做些甚麼，對方答，瑜伽。」這位瑜伽女生在一起完成了從大理到麗江的路程後，決定放棄，改乘其他交通工具抵達西藏。「我每天起床，都在想要不要放棄的問題，可是我心裡很清楚，如果真的放棄了，我以後一定不會原諒自己的。」

旅行獲得的勇氣

周榕榕曾想過做記者，大學選了新聞系，卻在畢業後的報社實習中打消了念頭。「跟我的性格有關，如果有事情發生，作為記者應該要在第一時間出現，但我卻想躲得遠遠的。」她對內心世界的探尋更有興趣，「我喜歡讀哲學書，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想，『我』是甚麼？又是怎樣的？」也許是常在旅行

中，她對自然事物的感官總被鍛煉得異常敏銳和細緻，在她的遊記書寫中，曾讀過她形容途中高原上的雲朵，像「擱淺在藍色湖泊中的卵石」，又或者在踩過沼澤地時，聽見尖草因不堪承重而繃斷的聲音，她是一個如此沉迷文字的人。

「我從來都不是靠運氣達到目標的人，」她笑着說：「真的，如果考試選擇題答案只有A和B，我就一定會選擇錯的那個。更不要說，什麼彩票、刮獎之類甚麼好事降臨。」這至少更讓人踏實。她幼年由福建老家移民來港，從英文零基礎到高考以4A的優秀成績考進中大。在大學期間，曾以幫人補習攬生活費、旅行費。「最多的可以同時做5、6份。我對考試很在行，很容易讓學生取得高分，所以收入不錯。」找工作時，曾一度想過做補習老師，「結果阿媽說了一句『沒出息』，斷了我的想法。」

這次旅行讓周榕榕清楚並堅定了一件小事：以寫作為志業。這也是一條極孤單、極艱難的路途，但看完她的《死在路上也不錯》，你會被她說服，甚至對她充滿期待。

文、攝：梁小島